

阿爾巴尼亞何去何從？

洪茂雄

一、前言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 (Partia e Punës e Shqipërisë，以下簡稱阿共) 第一書記霍查 (Enver Hoxha, 1908-1985) 於四月十一日去世，終年七十六歲。這位阿共領導人在阿爾巴尼亞掌權長達四十年之久，是共黨陣營在位最長的一位。他生前對內執行史達林路線，以史達林主義者自居，整肅異己，血腥統治阿國；對外則以「正統的馬列主義」保衛者與所謂的「現代修正主義」週旋到底，毫不退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扮演突出的角色。霍查一生徹底反霸，始終不渝，頗引人注目。

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 (Republika Popullore Socialiste e Shqipërisë) 是東南歐最小的國家，面積只有二萬八千七百餘平方公里，人口兩百八十四萬人，位於巴爾幹半島西端，東北與南斯拉夫接壤，西臨亞得里亞海 (Adria)，隔海與義大利相對，東南方則與希臘連接，境內有四分之三是山丘，僅沿海有狹小的平原，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基礎。阿國境內森林資源豐富，能源不缺 (有水力發電和石油)，又有礦產^①，但由於多年來閉關自守，經濟發展極為落後，國民平均所得只有八百四十美元，是歐洲生活水平最低的國家^②。阿爾巴尼亞以這麼一個蕞爾小國，居然在過去三十多年，先後和南共、蘇共和中共等三個共黨大國分庭抗禮，並且獨處一隅，既不參加「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也不參加其他歐洲事務，完全以自力更生的方式，過著鎖國主義的日子。凡此事例，必有其背景因素，本文擬從阿爾巴尼亞建立共黨政權以來，就領導人性格、民族意識、地緣政治等觀點，試論阿國這四十年的發展，其中以外交政策的演變和當前面臨的課題，作為本文討論的主要架構。

註① *Diercke-Weltstatistik 82/83*, (München: dtv-Verlag, 1982), S. 40.

註② *Der Fischer Weltatlas 1985*,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S. 228.

二、霍查與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人，是巴爾幹半島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祖先是伊利里亞人（Illyrian）。目前阿爾巴尼亞這塊土地，一千多年來，曾先後被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土耳其奧斯曼帝國長期統治過。至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阿爾巴尼亞在歐洲列強的影響下，始宣告獨立，而結束奧斯曼帝國長達四百五十年的統治；一九一三年七月英、法、德、俄、義和奧匈帝國等六國在倫敦召開「歐洲會議」，正式決定承認阿爾巴尼亞為獨立國，並確定了現在的疆界。阿爾巴尼亞從此才具備現代國家的型態^②。不過，為時不到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阿國在戰爭期間又遭到外力的侵入，分別由奧匈帝國、義大利、法國、希臘和塞爾維亞（Serbia）等國佔領。迄至一九二〇年六月外國佔領軍撤出，阿爾巴尼亞隨後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成為國際組織的一員。表面上阿國又向獨立主權的國家邁進一大步；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外國勢力一直介入巴爾幹半島的紛爭，而義大利對阿國的影響力尤為深遠。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阿爾巴尼亞曾出現二個親義大利的政權——諾里（Fan Noli）和索古（Ahmet Zogu），後者於一九二八年九月改變國體為君主國，自封國王^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阿爾巴尼亞淪為義大利的附庸，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義大利投降，阿國又由納粹德軍所佔領。由這一段歷史看來，阿爾巴尼亞從一九一二年獨立成為現代國家以來，一直飽經戰亂，依附外國，談不上真正的獨立統一。這段歷史教訓自然影響到爾後阿爾巴尼亞排外和閉關自守的國家性格。

依照馬克斯的說法，資本主義愈發達的社會，勢必引起工人革命，然後經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④。可是，證之歷史事實，貧窮與混亂，才是共產主義的溫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東歐所有被赤化的國家，均是在貧窮和社會不安定的情況下，予蘇聯共黨可乘之機，透過「共產國際」（Comintern）所促成的。阿爾巴尼亞共黨之得勢，就是在社會一片混亂下，獲得南斯拉夫共黨的支援，而取得政權。阿共正式成立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在此之前，共產國際在阿爾巴尼亞已進行秘密活動。阿人之所以對馬克斯主義思想懷有好感，首當歸功於列寧揭露一九一五年「倫敦條約」的秘密。根據該條約的規定，阿爾巴尼亞將被歐洲列強瓜分^⑤。列寧這項「正義之聲」，使得阿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幸免遭到瓜分的命運。因此，

註② Rolf Italiander (Hrsg.), *Albanien-Vorposten Chinas*, (München: Delp-Verlag, 1970), S. 107 ff.

註③ *Ibid.*, S. 18 f.

註④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 Gesamtausgabe, Bd. 5, II. (Berlin (Losc): Dietz Verlag, 1983), S. 13-14

註⑤ Paul Lendvai, *Der Rote Balkan*, (Frankfurt: S. Fischer Verlag, 1968), S. 196 ff.

當列寧於一九二四年一月逝世時，阿人曾以靜默五分鐘來悼念這位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領袖^⑦。列寧這項舉動自然對以後阿共的成長，具有鋪路的作用。

阿共領導人霍查一九〇八年十月十六日生於阿爾巴尼亞南部基羅卡斯特（Gjrokastrë）一個中產階級的回教家庭。一九三〇年在柯察（Korça）一家中學畢業後，即赴法國蒙特貝立葉（Montpellier），並在巴黎和比利時布魯塞爾留學，前後六年對共產主義思想已有了接觸。一九三六年返回阿國，在柯察中學擔任教師，一九四〇年移居地拉那（Tirana），在首都開設一家煙草店，同時成爲共產主義團體地下活動的聚會場所。此時，霍氏憑遊歐的經歷和無礙的辯才，已脫穎而出，成爲馬列主義團體的積極領導人物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霍查的領導才能已顯露頭角，並爲阿爾巴尼亞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他首先藉著參與反義大利入侵的游擊活動，號召馬克斯主義各派團結合作；再透過南斯拉夫二名共幹——柏波維奇（Miladin Popovic）和慕哥沙（Dusan Mugosa）的斡旋與督導，始得於一九四一年在地拉那秘密舉行的建黨臨時代表會議中，獲得領導權^⑧；隨後在一九四二年他進一步領導阿共整合境內游擊隊，推動在全國各地成立所謂的「民族解放委員會」，共同抵抗外來的侵略。一九四四年，霍查在阿國的領導地位已趨穩定，除了擔任阿共總書記之外，還兼任「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進而將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組爲臨時政府，自任部長會議主席，集黨政軍於一身^⑨。霍氏以三十三歲的年齡躍居阿共的領導人，一生仕途平步青雲，在共黨陣營中，可謂鮮少有像他那麼幸運的。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阿爾巴尼亞於次年一月十一日宣佈成立人民共和國。阿共則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從此改稱「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霍查去世之時，仍身兼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民主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和阿爾巴尼亞人民軍總司令等三要職。戰後他原仍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一職，但因一九五四年史達林逝世以後，克里姆林宮出現了集體領導，他乃仿效莫斯科黨政首長分由二人擔任的例子，將該職交給他的「親密戰友」謝胡（Mehmet Shehu 1913-1981）^⑩。

霍查終其一生，功過參半。就其對阿爾巴尼亞的貢獻而言，他是領導阿國在歷史上保持獨立最久的一位國家領袖，他不必尋求美、英和其他西歐國家的支援，居然能夠反抗國際共產主義的三大支柱——蘇共、中共和南共；在阿國與東西方隔絕並陷入孤立的狀況下，他還能夠使將近三百萬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和最基本的經濟福利。當前阿國的農業已可自給自足，能源工

註⑦ Richard F. Starr,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4th ed.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2), p.3.

註⑧ Paul Lendvai, *op. cit.* S. 201 f.

註⑨ *Ibid.* S. 205 f.

註⑩ *Ibid.* S. 211.

業已有進一步的開發（尤其是水力發電方面），石油、瀝青、銅、鉻等礦產可供出口，獲取外匯。另外，儘管霍查多次整肅異己，阿國的政局算是共黨國家當中最穩定的一個，這四十年來至少沒有出現過大亂子。就霍查的過錯而言，當然首推他執行僵硬食古不化的史達林主義路線，他以殘酷的手段整肅異己，連與他同舟共濟過的同志也難逃噩運。阿國境內毫無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成爲「一言堂」搞個人崇拜，唯「霍」獨尊。在戰前，阿爾巴尼亞人還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約有五〇%信奉回教，其餘信奉東方正教和羅馬天主教^⑩。一九六七年阿共正式宣佈爲一無神論的國家，所有的教堂和清真寺改爲歌劇院、博物館或倉庫或馬廄，教士完全消失^⑪。他晚年還大言不慚地誇稱，阿爾巴尼亞是世界上唯一堅持無神論的國家。除了這些令人不可思議的政策之外，阿國這數十年來，閉關自守，與東西方均不相往來，非但局限其文化的內涵，同時也影響國家邁向現代化的脚步。這都是霍查的領導性格使然，導致阿爾巴尼亞人平均國民所得無法突破一千美元大關，淪爲歐洲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

三、阿國外交政策之演變

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六年宣佈獨立以來，其外交政策的取向頗受領導人的性格、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影響。阿國位於東南歐巴爾幹半島上，也就是在英國地理學者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 1861-1947）所謂「心臟地帶」（The Heart-land）的南端^⑫，戰略地位重要，早期爲東西方交通必經之處，亦是兵家必爭的據點。因此二千年來，阿爾巴尼亞幾乎爲外來的勢力所控制，難得有獨立自主的機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的抬頭，加上馬列主義的教條以及霍查本人的領導性格，大致可以勾畫出阿國外交政策的輪廓。這可分四個階段來說明：

（一）親南時期（一九四一—一九四八年）：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之間的關係，在傳統上由於巴爾幹半島的政治特性，有種族的糾紛和領土的爭端，原本是敵對的^⑬。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爲雙方有其共同利害關係，抱持馬列思想，一起對抗軸心國的侵略，彼此開始有合作的可能。同時，阿共在這段時間，必須仰賴南共的支援，始能整合阿共內部派系。霍查即是在狄托的支持下，取得阿共的領導權。不過狄托對阿爾巴尼亞懷有野心，企圖合併阿國，俾在巴爾幹半島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大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⑭。在南、阿親密的時間，貝爾格萊德（Belgrad）曾苦心孤詣，除了掌握阿共的全部資料之外，並越俎代庖，爲阿

註⑩ *Der Fischer Weltatmanach 1985. op. cit. S. 228.*

註⑪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2. 4. 1985, S. 3*

註⑫ *Das Fischer Lexikon, Allgemeine Geographie, (Frankfurt: Fischer Verlag, 1968), S. 264*

註⑬ *Paul Lendvai, op. cit. S. 205 f.*

註⑭ *Ibid.*

國擬訂經建計劃。在南、阿條約中同意建立共同的價格與貨幣制度、共同的邊界關稅，以及聯合的經濟計劃；另外，在交通、礦產、對外貿易和銀行業務等方面，則組織南、阿聯合公司^⑩。狄托的野心不到二年工夫已露出破綻，爲史達林所不滿，而導致蘇、南共於一九四八年的決裂。

南、阿的友誼畢竟建立在戰時的共同利害關係上，其歷史上的民族仇恨和阿斯媒特 (Kosmet, 卽南、阿間Kosovo和Metohija 一地區之簡稱) 領土問題之存在，乃是雙方發展關係的重大障礙^⑪。因此，當狄托與史達林翻臉時，霍查正中下懷，立即靠攏莫斯科。

(二)親蘇時期(一九四八—一九六一年)：蘇、阿的合作，很顯然地，均合乎雙方的共同利益。阿爾巴尼亞投靠蘇聯，乃是維護獨立主權所必需，而蘇聯勢力的進駐巴爾幹半島，乃是莫斯科期待已久的目標。這樣的友誼關係，地拉那既可報復歷史上的仇恨，亦可輕易的取得外援(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莫斯科則可藉此制裁狄托，又可在亞得里亞海取得軍事基地。因此，這時期阿國成爲蘇聯集團攻擊南斯拉夫的傳聲筒，蘇共已完全取代南共在阿爾巴尼亞的影響力。

不過，蘇、阿的親密關係，隨著史達林的去世而逐漸疏遠，終至一九六一年宣告破裂。霍查之所以自稱史達林主義者，其來有自。首先，阿國的獨立係仰仗史達林的庇護，始得擺脫南斯拉夫的控制，故霍查視史達林如同救命恩人；其次，霍查自以爲獲得史達林的錦囊妙計，借助史氏的恐怖鎮壓手段，才能整肅與南共有淵源的異己，以保全統治阿國的實力。因此，當赫魯雪夫(Nikita Chruschtschow, 一八九四—一九七二)上臺以後，對史達林時代的個人崇拜進行批判，隨即鞭屍，引起阿國的恐懼與不滿。霍查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乃於一九五七年阿共中央全會中首次爲史達林辯護，並爲爾後蘇、阿共分裂注入意識形態的根基^⑫。一九六〇年蘇、阿之間的裂痕已見端倪，而中、蘇共的交惡，則是蘇、阿關係決裂的動因。一九六一年元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Bukarest)召開東歐共黨國家高峯會議時，阿共首腦雖未參加，但却公開支持中共的立場^⑬。地拉那隨即整肅阿共親蘇份子^⑭。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舉行第二十二屆共黨大會，邀請了八十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參加，唯獨阿共不被邀請，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一件大事^⑮。阿共在該次大會中受到赫魯雪夫嚴厲的攻擊，代表中共出席的周恩來則爲阿

註⑩ Ibid.

註⑪ 居住在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人共有二百七十三萬，約佔南國的人口七·七%，絕大多數落籍在南國科索沃自治省，即靠近阿國邊界。Der Fischer Welt-

almanach 1985 op. cit. S. 320.

註⑫ Richard F. Starr, op. cit. p. 24

註⑬ Ibid.

註⑭ Ibid.

註⑮ Ibid.

共撐腰^②。從此，蘇、阿共分道揚鑣，地拉那轉而投靠中共。一九六二年以後，阿國不再參與東歐集團的活動，首先退出「經互會」(RGW, Comecom)，一九六八年華沙公約集團入侵捷克後，阿國正式宣佈退出該軍事組織。

(三)親中共時期(一九六一—一九七八年)：當蘇聯勢力在巴爾幹半島消失後，中共隨即取代保護阿爾巴尼亞的角色。最初西方觀察家對中共是否有能力支援遠在歐洲的此一蕞爾小國，深表懷疑，連莫斯科領導階層亦抱持同樣的態度^③。可是，中、阿共此時均面臨孤立的威脅，彼此臭味相投，正符合雙方的戰略需要。因此，中共乃以驚人而有效的援助計劃，協助阿國各項基建工程^④。據有關資料顯示，一九六一—七〇年間，中共提供的經濟援助，在質量方面雖未達到蘇聯早期的貢獻，但却適時的為阿爾巴尼亞完成建設的基礎^⑤。六十年代是中、阿共的蜜月時期，雙方來往頻繁，形成所謂的「戰鬪友誼」，共同反帝，譴責「現代修正主義」。北平與地拉那之間，在意識形態上採取聯合陣線，向蘇聯展開鬪爭。在這段蜜月時期，周恩來曾三度(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訪問地拉那，阿國部長會議主席亦兩度前往中國大陸。

中、阿共的友誼關係，可謂因「共同需要」而結合，因彼此的瞭解而分手。中共在六十年代與蘇共的鬪爭，使得北平在國際共黨陣營中陷於孤立。為了挽回劣勢，中共試圖在歐洲開闢新戰場，利用阿爾巴尼亞做跳板，將其影響力伸入東歐。可惜這個構想無法得逞，東歐仍然是莫斯科不可侵犯的勢力範圍，地拉那的利用價值畢竟有限，況且這種「政治投資」付出的代價極為昂貴^⑥。基於上項認識，中共不得不於七十年代改變其對外政策；而阿爾巴尼亞則仍死抱著馬列主義教條，井蛙自大。北平與地拉那之間自然就會因彼此看穿詭計而分離。導致中、阿共親密關係結束的主要原因是：(1)國際形勢的變化，北平與華盛頓試圖改善關係，地拉那則自四十年代開始堅持反美，與華盛頓始終未建立關係；(2)鄧小平復出，其走資思想違背馬列教條；(3)毛澤東死後清算「四人幫」，阿共對其親密戰友受到整肅，深表不快；(4)中共邀請阿共仇人狄托訪問中國大陸(一九七七年)，無疑認同現代修正主義，對阿共是一項侮辱；(5)中共內部自顧不暇，已無力在世界各地推動馬列主義運動，令阿共失望。凡此數端，終使中、阿共在一九七六年暴露雙方的不睦，進而展開意識形態的鬪爭^⑦。阿共首先發難，於一九七七年七月批判中共自以為「一家之言」的「三個世界」理論^⑧。中共當然不甘示弱，乃於次年照會阿爾巴尼亞駐北平大使館，中止對阿國的經濟援助，並召回派駐阿

註② 許光泰：「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見：《東歐各國共黨，國際共黨研究》叢書，第一輯，(臺北：匪俄問題研究中心，民國六十七年)，頁四〇八—四〇九。

註③ Richard F. Starr, *op. cit.*, p. 25

註④ 參見：畢英賢「中共與阿爾巴尼亞的合與分」，《問題與研究》第十八卷第二期(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頁二十九—三十七。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中共對阿爾巴尼亞的軍經援助超過五十億美金，參見註④。

註⑦ 同註④，頁二十九—三十。

註⑧ 同註④。

國的各项工程技術人員。中、阿共的分裂，與六十年代初期中、蘇共的分裂，如出一轍！

(四) 徬徨孤立時期（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阿爾巴尼亞以一個共黨小國，在過去三十年當中，先後和三個共黨大國決裂，誠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空前的舉措。霍查的晚年，身體健康每下愈況。七十年代後期，與地拉那唯一保持友好關係的共黨國家乃是越南。然而一九七九年中共懲罰越南，並未促成阿國和越南的聯盟。越南畢竟心裏有數，它與地拉那結盟，不足以加強其反抗中共的聲勢。同時，在蘇、阿共關係未解凍之前，與阿國的過度親密，還會損害到蘇、越的友誼。由此以觀，阿國在東、西方的陣營中，將愈形孤立。到底，地拉那仍將繼續堅持其「正統的馬列主義」教條閉關自守呢？抑或逐漸開放門戶，回到東歐共產集團陣營？還是與東西方維持平衡關係？霍查的時代就在這種孤立與徬徨的狀態中宣告結束。

綜觀阿爾巴尼亞戰後的外交政策，大體上可以勾畫出下列的架構：

- (1) 外交政策的取向：五十年代採取區域聯盟，參與經互會和華沙公約組織，六十年代以後，則趨向孤立。
- (2) 國家角色：扮演解放支持者和信仰護衛者的角色，支持民族解放或反殖民地運動，並以正統的馬克斯主義自居，反對現代修正主義。
- (3) 國家目標：鞏固共黨政權，維護主權獨立。
- (4) 外交行動：鎖國政策，受到領導人性格、意識形態的限制，其外交行動僵硬，缺乏彈性。

四、當前阿國面臨的困境

霍查的時代已落幕，新的時代正開始。現年五十九歲的阿利亞（Ramiz Alia）二年前（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出任人民議會主席（即國家元首）。這位新任阿共第一書記，雖然蒙獲霍查的垂愛，刻意栽培，賦予治國重任；但以史達林主義者自居的霍查，長期統治阿國，其泥古不化，僵硬頑固的作風，却遺留下諸多難題，亟待繼承人去克服。未來阿爾巴尼亞至少面臨三項重大課題：

(一) 經濟問題：戰後阿爾巴尼亞的重建計劃得力於外援者良多，先是南斯拉夫，而後蘇聯，最後中共。照理說，以其現有的資源，應可發展成爲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可是這項目標並未達成，阿國仍然名列歐洲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當然，七十年代以來，歐洲遭遇二次能源危機的衝擊，沒有一國政府不爲經濟危機而煩惱，祇是因人民生活的要求，在程度上各有差異，各國制度應變的能力，乃是經濟發展成敗的重要關鍵。

阿爾巴尼亞由於自卑心理的作祟，從來不公佈有關國民經濟的統計資料，視此等資料爲國家機密，而予以保密，所公佈的僅

限於百分比。根據阿國公佈的資料，其工業增長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計劃，每年平均增長一三%，到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第七個五年計劃，頭兩年已下降為五·六%，農業增長率亦由百分之五下降到百分之三·八（見表一、表二）^②。阿國官方宣稱，

表一：1985年與1980年增長之比較（%）

社會總產值	34~36
工業總產值	36~38
農業總產值	30~32※
基本投資	22~24※
國民收入	35~37
按人口計算實際收入	8~10
財政總收入	34~36
財政總支出	33~35
出 口	58~60
進 口	56~58

※與第六個五年計劃的總和相比

表二：主要經濟指標完成情況（%）

年 代 項 目	1981年		1982年	
	原計劃增長	實際增長	原計劃增長	實際增長
社會總產值	7.6	5.6	9.6	4.4
工業總產值	7.2	6.5	8.5	4.7
農業總產值	10.1	7.2	15.2	5
國民收入	8.9	—	9	4.5

「七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要在加強工業化的基礎上，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全面發展經濟，並加強農業集約化，開展科

技革命，以及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④。這些冠冕堂皇的官方文告，却無濟於事。一九八三年元月阿共八屆六中全會已承認，有許多生產部門未完成國家計劃，影響了財政收入和對外貿易^⑤。事實勝於雄辯，要完全靠自己力量發展經濟，如同「土法鍊鋼」，解決不了人民的物質需要。其他東歐共黨政權唯恐與西方生活水平的差距拉遠，六十年代後期紛紛着手經濟體制的改革，講究經濟效益、市場供需、利潤等經濟手段，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可是，阿爾巴尼亞却甘願過著清教徒式的原始馬克斯主義的生活方式，其潛在的危機一觸即發，後果不堪設想。

(二)領導權問題：儘管霍查在晚年已安排好後事，如重新修正憲法（一九七六年）、扶植阿利亞並強化其聲望等，對他死後的權力轉移似乎已作了週全的準備；不過，從一九八一年「謝胡事件」看來，阿共內部的隱憂仍然存在。就謝胡個人而言，他是霍查的老戰友，高居阿國第二號人物，擔任該國部長會議主席長達二十七年，以這樣一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赫赫領導人物，居然會死得不明不白。據阿共官方的報導，謝氏是自殺身亡的。但案發後，各項跡象顯示，事態並不那麼簡單；謝胡可能是在政策的爭辯中被刺死亡。根據霍查死前的著作指稱，謝某乃是美國、蘇聯和南斯拉夫の間諜，其死亡是罪有應得^⑥。這麼一位重要的阿國領導人物，竟然會有如此下場，難免有人要問，阿共下一回合的發展又將如何？

阿共新領導人阿利亞，於一九二五年出生，十八歲那年（一九四三）加入共產黨，大戰期間先後擔任旅、師級的政委，一九四四年升任共青團中央書記，一九四八年擔任勞動青年聯盟中央第一書記，同年被選為該黨中央委員，一九五六年升任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六一年起再升為政治局委員，並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時僅年三十六歲，可謂少年得志。一九七六年九月霍查再提拔阿利亞擔任他的副手，成為民主陣線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霍氏自任主席）。謝胡死後的次年（一九八二）十一月，阿利亞成為阿國的元首，擔任人民議會主席團主席。從他這一份經歷看來，其領導基礎相當不錯，足可承擔大任。惟據研究東歐共黨政治的學者分析，現任阿國部長會議主席的查爾查尼（Adil Çarçani）和內務部長伊薩依（Hekuran Isai）二人亦是霍查親信，未來阿國的政局，查、伊二氏的角色，其份量不容忽視^⑦。

(三)開放政策問題：謝胡事件，一般西方的共黨問題專家認為可能是由於開放政策的問題所引起的一場劇烈的爭執。阿爾巴尼亞長時間的閉關自守，很顯然地阻礙了國家現代化的發展。因此，阿利亞上臺之後，首先面對的難題，是如何去執行或修正霍查

註④ 《世界知識年鑑》，（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一九七。

註⑤ *Osteuropa*, 4/84, S. 278 f.

註⑥ *Osteuropa*, 7/83, S. 577 f.

註⑦ *Ibid.*

的路線。儘管阿氏一再宣稱「繼續追隨霍查的方向，依照他的訓示前進」^②。可是，人亡政息，到底阿利亞無法保證未來阿國發展不會起變化。去年地拉那已出現一些徵兆，試探著對外開放腳步。這些不尋常的舉動包括有：與奧地利簽訂新聞協議，允許維也納派駐記者在阿國採訪，雙方並加強文化與貿易關係；西德基社黨（CSU）主席、巴代利亞邦（Bayern）總理史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ss）突訪地拉那，西德與阿爾巴尼亞洽商建立外交關係；阿國也在積極改善與鄰國的交通系統，如把北部鐵道通過南斯拉夫的中轉站，與歐洲的鐵路幹線連接起來，在南方與希臘接壤的邊界，開放一處通道，加強和希臘的經貿關係；在亞得里亞海開放了通往義大利的海上交通^③。凡此種種跡象，似可指明新領導人對未來政策的調整方向，以適應國內外的變化。促成地拉那對外開放的壓力，其經濟因素大於政治因素，阿國需要西方的科技，來帶動這個落後國家的現代化。

五、結 論

霍查統治阿爾巴尼亞將近半個世紀，他把這個巴爾幹半島的蕞爾小國，變成一個「真正馬克斯主義」的天下，唯一堅持無神論的社會主義國家。過去四十年，奉行史達林主義政策，先後與南共、蘇共和中共決裂，以正統馬克斯主義的護衛者自居，寧願孤守一隅，死不認錯，使阿爾巴尼亞人與世隔絕。這種領導心態現已蓋棺論定，它可能步史達林、毛澤東之後塵，受到批判。

霍氏的時代終告結束，阿利亞的時代剛開始。阿爾巴尼亞未來何去何從，令人矚目。從各種資料研判，地拉那的政策大致會朝如下方向發展：

- (一)鞏固阿國的獨立地位：爲了制衡東歐的壓力，地拉那可能逐步改善與西歐的關係，尤其是義大利、法國和西德。
- (二)面臨經濟的貧困，阿共勢必要實施溫和的改革，提高生活水平，以安撫民心。
- (三)緩慢而有限度的推動開放政策，引進西方的科技，以促進各項建設的現代化。
- (四)新領導人阿利亞必須穩定領導中心，初期可能出現集體領導，爾後阿共內部的權力鬭爭將難避免。
- (五)與鄰國加強經貿關係，地拉那與莫斯科的關係一時尚難解凍；在中、蘇共關係無顯著進展的狀況下，中共可能會再拉攏阿爾巴尼亞。

註② 同註②。

註③ 同註③。